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七四期 ——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11a)

【文革一页】	“文革”时期南同蒲铁路被冲击记事	黄建常
【史海点滴】	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	阎长贵
【百家争鸣】	重新评价华国锋	天 成
【当事者言】	我列席政治局会议	刘 冰
【不堪回首】	回忆周立波在“牛棚”的岁月	谭冬梅
【往事回忆】	江青被捕前突访二七机车车辆厂	郭臣善
【回首文革】	北大社教与常溪萍之死	冯 乔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文革一页】

“文革”时期南同蒲铁路被冲击记事

• 黄建常 •

中共九大是在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在北京召开的，是“文革”第三年的事。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新闻影片中，毛主席扳着指头说“已三年了。”这是“文革”达到的一个高峰期，回忆起来，正是在九大前后，山西南同蒲铁路却混乱的出奇！两派群众的武斗冲击铁路，使铁路这个国民经济大动脉无法正常运转。非法的 3.18 列车即是当时晋南铁路的“怪胎”，为此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照办”的“7.23”布告，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携带武器（以前是四不政策，支左解放军不准带武器的）去制止该段铁路的混乱。下面根据记录时间顺序，将当时该段铁路的实况叙述如下：

太原铁路局管内，在动乱时期，冲击铁路行车的事件大都发生在南同蒲线段。而在该线段内，以临汾为界，临北的行车被中断事件大都是路外群众组织的冲击造成的。而临南的武斗中断行车事件，则主要是路内的一派群众组织与路外勾结冲击铁路而造成的。

一、临汾以北情况

(1) 在临汾以北的冷泉—灵石间，1969年3月13日，因路外两派群众武斗，调度电话被打断，危及、中断行车一天，现场查看被打断的线路计四孔21条。致使两对客车和42对货车停开和滞留区间。处置：14日，我与生产组成员郭长生、曹益荣等协同现场工人乘马力车前往处理。在经过平交道口处时，亲眼目睹了血肉横飞的现场，据称：两派在武斗中死亡6人，伤十余人。其中一派乘汽车路过平交道口时，由于车上自带的地雷因震动而爆炸，造成自身的伤害。我们于13点开始抢修，当工人爬上电杆时，又有武斗人员时断时续朝我们人群开枪，我们冒着危险沉着抢修，于15点20分接通了线路，乘车返回。

(2) 4月22日13点，临汾北段南关—富家滩发生两派严重武斗。声称前方线路埋了地雷，炸坏了道岔，威胁列车不得过去，致使384次客车中途停车，给旅客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与调度人员分析后，派就近人员前往查看。但去后，也未获详情，判断武斗可能仍在继续。至于埋地雷与否和道岔是否炸坏可能有诈；客车中途停车，旅客的生活怎么办？！……此事因故延续数日。处置：分局决定派出专车单机挂卧铺和餐车各一节，由我与调度所的刘柱同志带领解放军战士一个班的护路部队及工兵前往察看。排除了钢轨上设置的水泥柱等物，并未发现地雷，道岔等也完好无损，但见到大路旁小推车前躺着一具穿着红裹肚的尸体。当我们的专列到达时，旅客及当地群众热烈欢呼着：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这几天被困扰的列车旅客多亏地方政府及人民群众的热心照顾，送饭送水，生活才得以保障。当日18点以后，我们将384次车底拉回太原。此次停车造成的损失比上次更大。

(3) 4月24日，榆次站因受到武斗冲击，无人接发列车，16点左右，有单机挂守车在修文站等待，由于榆次站无人接发车，列车一直等了4个小时。处置：后经调度电话出令，同意其开出在榆次站外停车，观察道岔线路，对后就进。这样将其放了进来，接着549次客车也采用类似方法放了进来。从此以后，这一方法一直延续到5月11日。

(4) 5月11日5点左右，榆次市在粮食局附近发生大型武斗中断了行车，拂晓我与生产组成员前去处理，目睹钢轨上放置的枕木、石头和麦地里横七竖八躺着的十几具尸体。处置：当即与车站人员一起排除了路障，组织了该站由任锁贵同志组成的临时通车指挥小组，进入行车室指挥接发列车，于当日16时完成通车任务，以后逐步恢复了正常工作。

(5) 5月18日6点，介休、义崇地区发生大型武斗，声称线路附近埋有地雷，并有武斗人员在看守。致使行车无奈中断，全天客货列车均受阻。383次列车在鸣李站停车3个多小时，车上有晋南军分区的宣传队300余人，直到20日才开下去，到达临汾。

(6) 5月28日14点30分，太谷车站发生武斗，致使行车中断。我与梁国瑞副主任前去处理，合并区间才使列车畅通。后查明武斗原因是站内两派群众因撕大字报引起，后经与站内两派职工座谈，解决其矛盾，直到30日10点才处理完毕。

以上记录是我印象最深的临汾以北的几起武斗断线事件。可能还会有遗漏的。

二、临汾以南的情况

从5月1日起，临南的线路各站不断的受到干扰，严重影响行车。5月3日起，路过襄汾的客货列车一律被迫停车，接受群众组织的检查，有的旅客被中途拉下车。5月4日的384次和90次列车因故开不上来。客车在经过襄汾站时，被强行甩下一节车厢，并抢走17套卧

具。5月5日，9台机车在临汾以南被扣而滞留开不过来，严重影响了机车交路计划。而且机车乘务人员不断被殴打，并被威胁说“再敢过来就枪毙！”一些车站同样也遭冲击。由于上述原因，383次不能开下去，旅客只好到临汾后下车，自找短途抵达目的地。由此就给旅客和临汾站造成了旅客疏导的困难。5月5日，分局决定381次客车要坚决开下去，虽已找好了机车的司机，却又因调度电话中断而不能开出；此刻却发现在侯马—襄汾间，有群众组织利用被扣客车和货车组成的列车运送武斗人员的情况。由于上述原因，5月14日，分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由王铁山同志起草，报分局军管会张副主任签发了一份电报。电报通告说“临汾以南客货列车因故暂停开行，通告广大旅客。”一石激起千重浪，当时分局万没想到，此电竟被临汾的一派群众组织污为“大毒草”。后来我想列车“暂停”本就是被迫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为旅客着想的。但未采取像南关—富家滩等处的方式，以听之任之的方式，相机处理可能会更好些吧！另外，暂停也是为寻求“消除滞涉原因，实现正常通车”暂时的必要的措施。因而从暂停开始，分局生产组筹措组织正常通车了。处置：1.向省革委汇报，派汽车沿线视察铁路设备状况，调查解决滞涉原因；2.建议省革委印发中央有关维护铁路畅通的“布告”、“命令”，以宣传群众；3.组织省专列宣传车南下，但调度电话仍未通，怎样保障行车呢？于是建议动用2.5—7.5KC无线电机代替调度电话，指挥专列南下。上述计划省里大力支持，行动快速，不久线路情况查清了，未发现有设备遭破坏情况……中央有关的“布告”、“命令”，及省新拟定的通告都正在印制中。动用无线电机的事经省革委韩生儒同志批示后，请刘格平、谢振华、张日清、陈永贵、袁振等领导圈阅完毕后，于5月20日，将开行专列的编组和人员组成等组织工作就绪，并将约半个车厢的宣传品装上了专列。

三、开行专列南下

分局决定以5101/2为专列开行。以太铁分局专列先导前卫车的名义开出，并事先在调度所放风出去给该派群众组织，此专列要直开风陵渡。专列于21日上午从太原开出，10点22分到达介休站时，专列临时停车，向正在该地区处理武斗事件的省领导谢振华、刘格平、陈永贵等请示，谢司令说：“大动脉！大动脉！赶快通……”领导们支持专列南下，并随即下令，沿线武装部门和部队要给专列通车以保障。列车一路以天女散花方式向沿途各站散发宣传品，到达临汾站时，忽得报告，临汾以南调度电话全线开通。但当专列到达襄汾站时，我从窗口望去，却发现约数十人的武斗人员，荷枪实弹，在麦地里匍匐卧倒，作出向列车射击的战斗姿态。站台上挤满了人群，此刻我令列车停车一分钟，让事先已准备好的列车工作人员，从窗口向站台大量抛发中央早已颁布的“七三”、“七·二四”、“二六命令”和省里新拟发的“通车通告”。当列车到达侯马站时，我们以同样的方法，向站台上的人群抛出宣传品，专列于当日17点40分顺利到达鸡鸣三省之地——风陵渡。第二天，我和列车人员到正在修建黄河大桥的五局工地参观，看到咆哮的黄河冲击着已在河中心竖起的高大桥墩奔腾而下，听取了大桥修建计划和当前涉路取送车中的一些问题。22日17点40分，专列从风陵渡开出，当天到达运城住下，向运城的群众组织做了宣传工作。23日9点30分，从运城开出，14点03分到达侯马车站，按计划停车后，我与车上成员同分局革委会周万喜副主任和新华社记者田培植、李国祥等下车，车上有护路部队和生产组成员郭长生、王铁山、冯维军等守护专列。当我走出列车时，站台上早已挤满了人，此刻周副主任与相识的（与其观点相同）3.18派头头曹福兴相见握手后，告我这是曹福兴。这时我心中有了底，而此刻站上的人群有组织的高呼异于寻常的口号，“支一派，压一派，你说应该不应该……”（当时群众组织林立，他们的言行不是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准的，因而解放军很难对他们事事都予以支持）这与平时常听到的“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我心中仍是沉着的。因有周副主任的一派群众头头在场。我随即拿出身上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众多群众让出的一条道中，大步走向车站室内，与该派的几个代表人物举行座谈，在听取了对方的意见后，我讲了大家要维护列车畅通，不要冲击铁路，对中央及省的布告和命令精神，希望大家遵守，保障国民经济大动脉的畅通。座谈了约两个半小时。开车后，待专列到达襄汾站时被拦截。专列停车后，在群众“要专列负

责人下车”的喧闹要求下，我不得已，向车门走去。此刻被后面上来的人踢了一脚，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未予理会，当然我还是找周万喜一同下车的。下车后，我问周“这号人中你认识谁。”周说：“一个也不认识。”这时我警觉起来，新华社记者也有点惊慌。田培植告我说“他去与武装部联系。”在一片骂声中，我与群众一问一答，正理论辩解时，武装部很快来了十几个人，把群众劝说开了。然后我们又上车，专列继续前进。当晚到达临汾站住下，与临汾1．26派座谈。第二天（24日）由临汾发车，18点30分返回太原。分局领导张秀同志前去迎接专列人员，和新华社记者亲切握手道谢。至此，5101／2专次专列胜利地完成了此次通车任务。

四、毛主席签发“7．23”布告

24日开通临南线路以后，一切并没有象我们期望的那样，从此就可以顺利地通车了。不是的，在列车勉强通行不到一周的时间后，临南的干扰铁路行车事件又重演，并升级了。群众组织公开开行了3．18派性列车，并且武斗更加升级了。6月初，列车在严重的枪弹袭击下，只好退回临汾。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7月23日。毛泽东主席终于了解到该段铁路的真情，批发了“照办”的针对晋南地区铁路的7．23布告，在布告中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携带武器，对3．18非法列车进行处置，（同时全国各铁路干线的护路解放军也均可仿效行之）。这样不久，3．18列车就被制服了。从此南同蒲铁路才开始了正常行驶，这条大动脉才真正的畅通了。

在这次通车中，生产组张颀同志前往。他回来后交给我两张3．18列车被制服的照片，并告我说，3．18列车的组织者说：“没想到我们的列车毛主席竟也知道了。”

□ 《文史月刊》 2008年第8期

~~~~~

#### 【史海点滴】

#### 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

• 阎长贵 •

2001年，毛远新从上海一个汽车研究所总工程师的岗位上退休了。毛远新来北京时，曾到我家作客。现把交谈中谈到的几件事情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 ◇ 毛远新读大学怎么去的“哈军工”

毛远新的中学是在北京101中学读的。1960年暑假毕业时，毛远新被学校保送“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回家后，他告诉伯伯毛主席，毛主席说：“保送算什么本事？”毛远新毅然决然地回答：“那我考！”主席说：“你考什么学校？”毛远新说：“考最难考的。”毛主席说：“那就是北大？清华。”结果在统考中，毛远新考取了清华，并到清华读书。后来，有个高干子弟跟他说：“远新，你还是应该去哈军工。”毛远新有些心动。回家跟毛主席说：“伯伯，我还是想去哈军工！”毛主席笑着说：“那就看陈赓接收不接收你了。”当时，陈赓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当动员毛远新“还是应该去哈军工”的那位高干子弟把这个消息告诉陈赓院长时，陈赓立刻打电话给毛远新，说：“热烈欢迎你来哈军工！”就这样，毛远新从清华转到了哈军工，成为哈军工的一名高材生。

#### ◇ 毛主席让毛远新找吴法宪安排工作

1965年暑假，毛远新从哈军工毕业了。谈到工作问题，毛主席叫他去空军找吴法宪。吴法宪热情地接待了他，给他安排到某团部当参谋。毛远新回来跟毛主席说了这个情况。毛主席说：“没当兵，怎么就当官？不行，再去找吴法宪，重新安排。”其实，一个团部参谋也算不上什么官。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毛远新又去找吴法宪。吴法宪听了毛主席的意见，非常感动和感慨，说：“主席对自己的子女要求真严格！”这样，吴法宪一下子就把毛远新安排到云南边防的一个炮兵营去了，他实打实地当了一名操炮手。

#### ◇ 毛远新在“文革”中做过三次联络员

现在所有谈到毛远新的文章和著作中，说他做联络员，只谈到1975年这一次（当然这是最重要的一次）。实际上，毛远新在“文革”中做联络员，不止这一次，而包括这一次，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做周总理的联络员。1966年9月，他从云南部队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始好几个月了，他对要打倒刘少奇的事，还不知道什么。毛主席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的全过程，至于去哪个单位由他自己定。毛远新考虑了一下，他是101中学毕业的，但离开6年多了；离开哈军工才一年多，那里还比较熟，于是他决定去哈尔滨。毛主席同意。毛远新到哈尔滨时，对立的两派早形成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造反派的一个领袖。他说，当时很威风，很神气，连省委书记潘复生，都经常找他联系，或“请示”工作。后来，他又到延边造反，还参加过那里的武斗。1967年春夏，他回到北京后，住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住的楼）。毛主席因为他到少数民族地区造过反，要他读点民族问题的书，研究一下民族问题。为此，我（当时任江青的机要秘书）还帮他到《红旗》杂志图书室和中宣部图书馆借了十几本关于民族问题的书（主要是列宁的）。在这次交谈中，我问他，在1967年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周总理转来你写的信让江青阅，怎么没看到你给江青写信啊？他告诉我，他从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就是周总理的联络员。这是他在“文革”中第一次当联络员。

第二次，是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1967年春夏，毛远新正在认真研究民族问题，有时还到我办公室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记得他说不同民族终究是要融合的。一天上午，他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说，毛主席要他不要回延边了，也不回哈尔滨了，留下来，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对此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相处甚洽，很谈得来。不一会儿，江青从外边回来了，她到我办公室，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高兴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听她这样夸毛远新，我感到很别扭。就在几天前，她从外边回来，一进门就问警卫员孙占龙：“李讷住这里吗？”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什么？”孙也没再说什么。毛主席为什么把毛远新留下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呢？我们所能看到的原因，就是毛远新和这两派的领导人都很熟，因此让他帮助做两派联合的工作。这是毛远新在“文革”中第二次做联络员。

第三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远新1975年做毛主席的联络员。这确实是毛远新在“文革”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次联络员。其作为人们已经说过很多了，都知道了。我只补充一点，他是怎样做了这次联络员的。2001年，毛远新到我家作客时，他告诉我，1975年9月至10月，他作为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参加完庆祝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告诉他，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那两个“小耗子”跳船了。毛远新以毛主席的意志为意志，就这样，他留下来，做了毛主席的联络员。这实际上是他在“文革”中第三次做联络员。

#### ◇ “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远新曾告诉我：在1975年做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我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按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她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我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我没答应。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我给她搞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主席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怕江青拿着毛主席画了圈的这封信找我，就去问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 ◇ 毛远新说他进监狱是“三进宫”

毛远新说的所谓“三进宫”，是指当局两次准备想让他从监狱里出来，都没成功，以致他继续留在监狱里。1976年10月6日晚抓“四人帮”时，毛远新也被换了住的地方，当时宣布对他是“保护审查”，其实和对“四人帮”的“隔离审查”没有什么不同，后来都是关在秦城监狱。按照毛远新的说法，这是“一进宫”。1982年，有人奉上峰之命，找已关押了六七年的毛远新谈话，希望他写个材料，替毛主席承担一些责任，说这样做一下就可以出去了。毛远新说，这个责任，我承担不了，都有毛主席写或批的字，其数量有一大摞。那人再三劝说。毛远新答应写就写吧。接着说，材料在监狱怎么写啊？那人说：“好，给你找个地方。”毛远新住到了秦城监狱招待所。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材料，送上去。上面不满意，说他“顽固不化”。毛远新继续关进秦城监狱，他称这是“二进宫”。1986年经过审判，毛远新被判刑17年。罪名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毛远新告诉我，按照当时的意见，判过了就对他实行“假释”。在这时候，他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毛主席写的那些批示还给他——有关人员说，这恐怕不可能，毛主席写的东西，那是文献，都要存档的；二是在毛主席书房放着的一套新的《二十四史》，那是毛主席给他的，希望还给他——有关人员说，这个可写报告。毛远新比划着跟我说，你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在毛主席书房的一个地方放着同样版本的两套《二十四史》，那套旧的，是毛主席看过的，上面有他的批注；那套新的，就是毛主席送给我的。毛主席为什么送毛远新这套《二十四史》？毛远新解释说，在我当联络员期间，我拿毛主席看过的《二十四史》看，有时毛主席也要看，这就发生冲突。因为出现这种情况，毛主席说：孩子，这样吧，我给你搞一套同样版本的《二十四史》，你可以把我的批注抄在上面，这样我们都可以读了，并且还可以讨论。这就是毛主席送我一套《二十四史》的原因和情况。“天公不作美”。正准备“假释”我的时候，恰逢胡耀邦辞去中央领导职务，这件事就被搁置起来，我继续被关在监狱。这就是毛远新所说的“三进宫”。

毛远新说：我的妈妈朱丹华，还有我的妻子、女儿，都急盼着我出来。1989年3月，我妈妈找了杨尚昆，要我“保外就医”。杨主席发令，公安部同意放我，让我到江西我妈妈那里去。这样决定后，公安部的人问我：“你什么时候走？”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明天就走！”——这是我吸取了“假释”不成的教训，怕“夜长梦多”。公安部的人说，明天走怕搞不到票吧。我立马接上去说：“我不相信你们公安部的人搞不到几张去南昌的票！”就这样，第二天，我总算走出了呆了10多年的秦城监狱！

□ 《党史博览》 2008年第8期

~~~~~

【百家争鸣】

重新评价华国锋

• 天 成 •

华国锋走完了人生，去和他最想见的毛泽东和最不想见的邓小平在另一个世界又见面了。8月31日，华国锋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胡锦涛携政治局全体常委为他送行。

◇ 民众的印象

50岁以上、对文化大革命已有切身感受的人，大多对华国锋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是华国锋解决了令大多数人反感的“四人帮”，结束了使国家和人民深受其害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人们称华国锋为“英明领袖”，我相信绝大多数是发自内心。在邓小平、陈云、王震等反对华国锋的老人们相继去世后，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这说明，华国锋在党内，仍然有很高的威望。

40岁到50岁的，多数人知道华国锋，但是对华国锋不会有太深的印象，因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太深的印象，而华国锋短暂的执政，也不会使他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40岁以下的人，要不是赶上了华国锋去世，可能大多数都不知道历史上有华国锋这个人，更不知道这位华国锋曾经是建国以来唯一身兼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最高实权领袖的人。少数知道的，也就是从带有演义性质的文革传记里读到了不同版本的故事，加上当时对华国锋的负面宣传，有点印象也未必是好印象。

据新华网报道，8月31日上午参加华国锋遗体告别仪式的人约有近两千人，几乎全是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礼堂外的广场上，民众亦自发地拉起横幅、举起画像，向这位前中共领导人致以最后的敬意。

◇ 评价的区别

从新华社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题发表的华国锋生平，可以看出，现任的中国政府领导，对华国锋的评价，与邓小平搞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华国锋的评价，有很大的不同。

1、在粉碎“四人帮”方面

过去的评价：他（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

现在的评价：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这里，还原了历史面貌：是华国锋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不像某些传记里写的是其他人提出来的；而且明确华国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不只是“有功”。

2、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

过去的评价：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

进程。

现在的评价：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

3、在个人品德方面

过去的评价：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现在的评价：他党性原则强，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他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

4、经济建设等方面

过去的评价：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现在的评价：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5、其它罪状方面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关于华国锋的几条主要罪状，即：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在华国锋的《生平》里都没有提及。

相比之下，赵紫阳去世后的评价就远不如华国锋了，在新华社简要报导赵紫阳的生平中，只字未提赵曾担任国务院总理、党总书记、以及他在改革开放中的重大贡献，却特别指出赵在89年“犯了严重错误”。

现在活着的领导和华国锋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这也许是他们能较为可观评价华国锋的重要原因。

◇ 小平欠公正

我一直认为，在对待华国锋的问题上，邓小平的做法过头了，为了逼华国锋让位，他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甚至采用非组织手段。他自封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又把一个刚上台毫无建树的的江泽民封为第三代领导的核心，就是要从根本上抹掉华国锋的历史地位。后来对胡耀邦、赵紫阳也是这样。

1、邓小平为了贬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不实事求是地强调其他人的功劳，否定华的决定性作用。

邓小平在1980年8月回答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这是集体的力量。”“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华国锋下台后，这段历史被改编为，在粉碎“四人帮”这个事情上是李先念帮了华国锋大忙。是李先念找了叶剑英等等。华国锋谈到，最初他和汪东兴去找李先念商量，要他参与把“四人帮”抓起来，李先念听后开始怕得不得了，因为他知道搞不成的话这可是杀头的。后来他答应华国锋，去和叶剑英联系。

陈云、王震等人通过各种形式，纷纷抢功，似乎粉碎“四人帮”，他们也有功劳，而当时他们自己还没解放。为了达到抢功的目的，他们还把邓小平捎带上，说他们和邓小平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许多拍马屁的人甚至出书杜撰的有鼻子有眼。

在陈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被软禁的邓小平，曾经在王震的联络之下，秘密会晤了叶剑英，商谈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手中，有一本邓小平在世时（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在1976》的书，书中提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前，邓小平暗访过叶剑英。作者为了证明其有根有据，还提到由叶剑英的秘书范硕撰写、王震作序的《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也有类似情节：邓小平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帅的住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

故事编得太离奇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不得不出面澄清。她指出：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

2、邓小平指责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讲话里确实都提到过“两个凡是”，但他是否坚持“两个凡是”，应该客观地分析。

按江青的说法，“主席尸骨未寒，就对她下手”，华国锋面临的压力是其他人所不能比的。华国锋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威望和力量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经过几十年对毛泽东的神化，如不高举毛泽东的旗号，他很难站住。在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里，对毛泽东无比崇敬的占了绝大多数，因此对华国锋来说，比较好的能稳定政局的办法就是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原来的那一套去做。邓小平掌权后，虽然把毛泽东建国以来搞的那一套全推翻了，他不是仍然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吗？

实际上华国锋对扣在他头上的这几顶帽子并不服。他对采访他的人说：有人说我是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我都拥护和无条件地照办，其实我并不是这样做的。如果我的思想真正到了这样僵化的地步，我能把叶帅请出来吗？我敢于做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吗？我敢于真正解放邓小平同志，他能有今天吗？所以，说我推行“两个凡是”的路线，实在是有点冤枉。

华国锋讲的有道理。毛泽东临终前，之所以剥夺叶剑英的军权，让陈锡联取代，就是不信任叶剑英。华国锋依靠叶剑英，本身就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虽然开始华国锋对解放邓小平有顾虑，但他最终还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解放了邓小平，并让他掌握了军权（兼任总参谋长）。如果没有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的下场一定很惨；如果华国锋不让邓小平掌实权、军权，邓小平也难有所作为。就凭这一点，邓小平就应该感谢华国锋。其他所有的平反，包括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平反等等，胡耀邦等做了大量工作，但没有华国锋批准，也是难以解决的，这都反映出华国锋并不是死抱着毛泽东的指示不变。

3、邓小平指责华国锋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华国锋主政期间，是中国政坛最宽松的时期。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在《财经》第9期上撰文回忆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华国锋，讲了几句公道话：“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的工作。相反，华国锋以后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华国锋主持召开的。在这之前，先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212人。这次会议共开了36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我因某种原因，当时有机会看到会议的所有材料。华国锋主持会议，会上明确表示：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会议每天出简报，刊登大家的意见。会议涉及到毛主席在延安整风及建国以来所犯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革”中的错误。会议上，许多人要求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与会者还批评了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人。华国锋不但没有为此动怒，堵塞言路，而且就所涉及的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这为开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样宽松、民主的会议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至今许多人还认为，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是难能可贵的，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包括邓小平本人。

历史选择了华国锋，在关键的时刻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做出了别人难以做到的决断，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历史造就了华国锋的老实，当他感到因他的思想和能力都不及邓小平，历史要求他让位时，他拒绝某些人建议他采取的政治手段，平和地退出历史舞台，为邓小平执政让路，使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道。

华国锋有他的不足和问题，但是他的民主作风及亲民形象，是后来的历任一把手所不及。

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应忘记这位老实人。

~~~~~

【当事者言】

我列席政治局会议

• 刘 冰 •

（编者按：刘冰和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四位在1975年因不满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的行为，通过邓小平上书毛主席。）

1975年11月3日下午2点25分，迟群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到我的住宅叩门，我问：“有什么事？”他说：“下午3点钟在第二教室楼召开常委会，迟群让我告诉你。”这位年轻人，平时见面总是笑眯眯的，此刻，他面色沉重而又有些为难，表情很不自然地站在门口。从他的神态和吞吞吐吐的话语中，我意识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送走了年轻人，我立即打电话给惠宪钧，告诉他迟群办公室来人通知3点钟开常委会，我判断是有关我们信的问题，请通知老柳迅速到我办公室商量对策。我骑自行车赶到办公室已2点40分。惠、柳二人的判断和我一样。我们分析，既然常委会的召开是关于我们信的事，开会不和我们商量，搞突然袭击，证明毛主席支持迟群，而不支持我们。怎么办？我们三人紧张地商量着，认为我们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切按党的原则行事。既然是关于信的问题，很可能要我们在会上宣读，于是老惠跑步到他办公室取来信的底稿，然后我们三人快步走向第二教室楼，进了会议室刚好3点整。

满屋子都是人，黑压压一片。我们径直地走到按惯例常委会开会时书记们的席位就座。这时我才注意到，除了常委、各系党委书记、校级各部处负责人外，还有很多生面孔。后来发现有北大党委的人，我这才明白了那些生面孔都是北大的人。三点一刻，吴德同志在迟群、谢静宜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出于礼貌，我站起来同他握手，他冷冰冰地点点头，我已伸出的手只好收回来了。看到他同迟群、谢静宜肩挨肩、亲密交谈的样子，我感到失望。吴德从座位上站起来，清了清嗓子说：“这一个时期，清华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刘冰、惠宪钧、柳一安三位副书记和常委吕方正四人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告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和我们的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他们的信作了批示，现在我把批示的主要精神给大家传达一下。”然后，他对主席的指示，隐而不露，用他自己的话说了一大篇。这些话里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他自己的，谁也分不清楚，但给人的印象是：刘冰等人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提示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这个是非要弄清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进行讨论，辩论认清问题的性质。”然后，他宣布：“这个会请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同志主持。”这时，迟群仰起头，神气十足地站起来说：“现在开会，先请刘冰他们把他们的信在这里念一念。”我站了起来，拉过话筒，开始念信。我想这是难得的好机会，要利用这个讲台揭露、控诉迟群、谢静宜的罪行。我放开嗓子，大声朗读，心想要让到会的每一个人，要让全清华所有的人都能听到迟群、谢静宜的条条罪状。迟群事先布置的娄罗们不断对我围攻，搞得我没法念下去，我几次提出不念了，他们才不得不暂停围攻，让我把信念下去。

念完了信，“帽子”、“棍子”一齐向我们打来。骂我们是“诬告”，是“恶人先告状”，是“欺骗毛主席”，是“用写信的办法反对毛主席”，等等。吴德同志插话说：“刘冰！你应该老老实实，把你们的活动拿到桌面上，不要在桌子底下活动。”也许吴德同志有什么难处，但这种时候，说出这样违背事实的话，迫使我不得不说：“我们没有搞桌子底下活动，我们完全是按照组织原则办的，给市委科教组汇报过，给吴德同志报告过。”吴德说：“你没有给我报告，你那是信。”我说：“信也算数吧！我们还两次请求你接见，要向你汇报，这是在桌子底下活动吗？”他哑口无言了。

已是6点钟了，迟群宣布散会，并要我和惠宪钧、柳一安留下，给我们宣布纪律：“不准相互串联，不准到校外，不准请假，要按时上下班，不准迟到早退。”从此，实际上我们已被专政，失去了自由。

第二天，二教楼会议室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最为显眼的是《走资派还在走》和《投降派确实有》这两张大字报。前者是对着我的，后者是对着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同志的。这两张

大字报的内容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冠以不同的标题呢？似乎表明了他们“区别”对待、进行“分化”的策略。批判会一层一层地扩大，到了11月12日，扩大到全校支部书记以上党内外干部一千三百余人，主会场是二教楼，分会场安上了有线广播。每天像学生上课、工人做工那样，八小时开会批判斗争……

11月15日，对我们的批斗进入第13天。这天下午5点半散了会，6点钟我回到家里，6点半接到谢静宜的电话，要我7点钟在西南门上车到人民大会堂去。我问干什么，她说：“你到大会堂北门下车后，告诉哨兵，你是清华大学的刘冰，他会领你进去。”经过和妻子商量，我决定前往人民大会堂，但做好了被捕的准备。据我的记忆，是在东大厅。厅内有几个女服务员在摆放沙发和茶几。后来汪东兴同志来了，他问：“你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我答：“我是清华大学的，叫刘冰。”他说：“啊！你就是刘冰！过去没见过面。”这时谢静宜来了，她看着我恶狠狠地说：“你来了。”然后她和汪东兴一边走，一边小声说话。我怕影响人家保密，赶快走到一个较远的沙发前坐下，等待着。差5分8点。这时陆续进来了一些人，先是政治局委员们，接着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同志来了。大家都在摆成圆圈形的两排沙发前入座，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其他人都坐第二排。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靠近坐在一起。我看到这种情况，肯定这是政治局会议。于是我离开墙边的沙发走到会场内第二排座位挨着胡耀邦同志坐下。我的前面是纪登奎同志，他转过身子同我握手，我向他问好致谢。8点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邓副主席接着又传达了主席的其他一些指示后，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然后把记的两片纸放在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张春桥狂妄地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这种蛮横态度，对于中央副主席甚至主席都是不尊重的，我感到厌恶。邓副主席刚回到座位上，姚文元插话说：“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副主席没有理睬他，他却大声嚷嚷重复着刚才的话，并指着我们问：“你们听过没有？”我说：“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吴德立刻声明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邓副主席说：“那好吧！请毛远新给传达一下，远新你讲吧！”于是毛远新慢慢腾腾翻开笔记本念了毛主席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个传达，真如晴天霹雳！我靠在沙发上，脑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率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会场上什么人再说什么，我全没听到，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说我矛头对着他老人家，从何说起！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正是抱着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才向老人家报告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矛头是对着他的。我想不通，我怀疑。但这是毛远新传达的，白纸黑字，明白无误。现实是多么残酷！

我必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只听到邓副主席说：“讨论吧！”王洪文说话了，他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他列举了一些只言片语后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张春桥插话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姚文元跟着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你一言，我一语，讲个不停，时间几乎全被他们占了。江青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在会场旁边走动，嘴里嘟囔着，有时猛然提高嗓门，阴阳怪气说几句什么，我听不清楚，但可以看出她是给王、张、姚打气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说话。叶剑英副主席除了偶尔喝点水或偶尔用毛巾擦擦脸，一直在默默地记笔记，什么话都没说。11点钟左右，邓副主席说：“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政治局委员陆续退席，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走在后面，步伐缓慢而坚定。从两位老人布有愁云而又严肃的面容上，我似乎感觉到他们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思虑。

走出大会堂，等人们都上车走了，我才从台阶上走下来，找到清华的车子。一路上我在想，主席说的“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含义是什么？想来想去觉得主席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在会议上作检查，在会议上接受批判。既然是这样，在明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我就该检查了。主席批示中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又点名要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毫无疑问，我对主席批示持何种态度，主席定会注意的。但如何检查呢？

午夜12点整回到家里，妻子苗既英惊喜我能回来，脸颊上滚淌着热泪。她问：“怎么回来了？”我说：“主席指名要我去参加政治局会。”她惊讶地问：“参加政治局会？怎么回事？”然后我把主席批示和指名我们参加会议的详细情况讲了一遍。“这真是冤枉呀！”她说出这句话后久久不语，一直用手绢擦眼泪。停了一会儿，她用怀疑的口气说：“老人家是不是真的糊涂了？他八十多岁了，人老了容易糊涂，这个批语不是颠三倒四吗？”我说：“不全是糊涂，而是听了毛远新、谢静宜一面之词。小平同志转个信是偏袒我，这不正常啊！现在只有检讨，争取留在党内，只要活着，过几年再说。反对毛主席的帽子现在已经给戴上了，我怕开除党籍，一旦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明天晚上政治局会议上，恐怕我们五个人要检查了，现在要想想如何检查。”她说：“一个是检查，一个是不检查。我们没错检查什么？”我说：“主席说矛头是对着他的，不检查行吗？不行！因为那样会给再戴上一顶对抗主席的帽子，岂不更冤枉。”她说：“你不能过细检讨，原则上表个态就行了，不能给自己戴帽子。”我说：“毛远新是要给主席汇报的，不戴帽子，主席通不过。”她坚决地说：“要给自己留个余地，将来好翻案。你再仔细想想怎么办好。明天你好好准备一下，现在该休息了，已是3点钟了。”我们都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仍然商量着在政治局会议上如何检查的问题，直到东方发亮。

我一整天待在办公室准备晚上的检查。我的思想从来没有这样紊乱过，矛盾重重理不出头绪。不检查，怕给我扣上反主席而又不认错的帽子，开除党籍，永远说不清楚；检查吧，检查什么？把没错说成错误，这不是对主席不忠吗！翻来覆去想呀，想呀，最后无可奈何地下了决心：作违心的检查，争取过关，将来再说。

我晚上7点50分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政治局委员们也陆续到来。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仍然挨近坐在会场的东边。晚8点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他说：“现在开会，先请毛远新同志传达主席指示。”他接着说：“远新，昨晚的会你向主席汇报后，主席有什么指示，你讲吧。”毛远新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本子，一边翻着，一边说：“昨晚的会，我向主席作了汇报。”随后他念着本子上的记录，他给主席说了什么，主席听后讲了些什么，一段一段地念了大约40分钟。我一边听，一边感到毛远新的汇报有明显的倾向性，实际上等于他出题目，主席来回答。毛远新传达完毕，邓副主席说：“你们五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会，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吧？”胡耀邦同志站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五位同志来参加会，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说我说出了什么话，我都郑重表示，我没有那些问题，也没说过那些话，请求中央查证。我与刘冰在团中央一块共过事，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转信，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他，但信要由他自己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我是科学院，他是清华大学，所以我不能帮他转信。”耀邦洪亮的声音在会场回荡。他发言后，好久没人说话，王洪文也无言以对。

过了一会儿，邓副主席说：“你们谁还说话呀？”我看看周围没人回应，待不住了，就说：“我发言。”我刚说话，邓副主席说：“刘冰同志，我耳朵背，你坐在我旁边讲，好不好？”我赶紧走过去，坐在他老人家左边的座位上。我说：“主席对我作了严厉的批评，我在这里向主席、向中央作检查。”接着发言的是胡乔木、李昌、周荣鑫三同志。

乔木同志发言中讲到我的问题时，他说：“刘冰同志的第二封信是我送给小平同志的。”这时猛然从背后响起尖厉而有点沙哑的声音：“乔木！你反对毛主席呀！我现在才知道。”我扭头，

看到是江青在说话，她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前，上面还摆着饭菜，据说她才吃晚饭。她猛然站起来追问：“你为什么给刘冰送信？”乔木说：“我不认识刘冰，也不认识迟群，只是听说过他们，我对刘冰印象好一些。”江青怒冲冲地用她那颤抖的声音说：“乔木呀！你反对毛主席呀！”“你是主席的秘书，你反对主席我没料到。”她歇斯底里的“棍子”加“帽子”的发言，使我感到厌恶。怎么送封这样的信就是反对了主席？合乎逻辑吗？还有真理吗？周荣鑫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来晚了，他最后发言。在他发言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这四人不断插话，实际上形成了对他的围攻。而从会上另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表情，可以看出对他们这样霸道是不满意的。时间已经11点多了，邓副主席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散会。”这天的政治局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政治局会议之后，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动作更来劲了。从11月19日开始，我和惠、柳、吕四人实际上被专了政。我的办公室的文件柜被贴上了封条，一些重要文件被抄走，每天上下班有人跟着。迟、谢们通过北京市的领导命令各单位来清华看大字报，并在各单位逐渐展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新的“高潮”又来了。

这些天，由于拉我到系里批斗，迟、谢们对于我去不去办公室似乎放松了，我待在家里的时间较前些天多了些。11月底的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听到有人叩门，我开了门，进来的是项南同志的女儿项小米。我感到惊奇和高兴。因为我是被监视的，我问她：“你怎么来的？门外附近有人吗？”她说：“乘我爸爸的车来的，门外没看到人。”我说：“小米，我是被监视和专政的，我怕有人看到你来这里。”她说：“我不怕，他们敢怎么样？”然后她告诉我，他们先到了北大，项南留在那里，让她来看我。她说：“我爸爸问候你并要你注意身体。”听了小米的话，我深受感动。我是戴着“反毛主席”的帽子，处在被批斗的逆境中，项南让他的女儿冒着风险来看我，这是比金子还珍贵的战友之情，我从心里深深地感谢他和他的女儿。我让她坐下，详细问了她外面的情况。她说：“现在就是清华、北大在批判你，其他单位和地方都还没有动作，但情况很紧张，很多人都知道了你给主席的信和主席的批示，一些老同志都不敢相互来往，有些人家里的电话有人监听。”她还说：“刘叔叔，你要特别提高警惕，江青、迟群他们会用各种办法整你的，他们会搞人监听你的电话，你不要再打电话了，他们抓住一点鸡毛蒜皮会大做文章来整你。”小米的一番话，使我感到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后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炼成熟起来了，顿时我脑海里燃起了希望之光。

□ 摘自《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4月版

~~~~~

【不堪回首】

回忆周立波在“牛棚”的岁月

• 谭冬梅 •

◇ 初进“牛棚”

1969年7月的一天，天气又闷又热，一辆卡车开进湖南省革委会“五七”干校的大院里。

“周立波，快下来！”卡车刚停住，一个身穿黄制服、满脸横肉、胖乎乎的家伙，凶神恶煞般地吆喝着。

一听“周立波”的名字，我不觉一惊，忐忑不安地走过去。只见周立波弓着瘦长的身子，

从车上慢慢地爬了下来。他手里抱着铺盖卷，头戴青色制帽，身穿白色衬衫，架着一副近视眼镜，颧骨突出，脸庞瘦削，面色苍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差点叫出来：啊！11年不见，就苍老这么多了！顿时，1958年秋天，我第一次在北京香山见到周立波的情形，浮现在眼前。那时，他虽然也很瘦，可是，脸色红润，神采奕奕，精力充沛，谈笑风生。

周立波走进“牛棚”，一见里边都是熟识的老领导、老同事，他微笑着一点头打招呼。可是，回答他的却是冷漠，凄然的眼光，和死一般的静寂。我看到周立波立即收敛了笑容，眉头紧锁，两个眼角鱼尾似的皱纹，伸向银灰的鬓发。不知是他不忍看这冷酷的现实，还是他要记住这个生活的镜头？

沉默、冷淡，并没有使周立波发窘。他轻巧地打开被包，熟练地在房间西头靠北面的一角架起地铺来。他刚架好铺，“专政班”的那位方头圆脸、头顶光秃、个子矮胖的班长走了过来，摘下老花眼镜，像演员背诵台词似地向周立波交代：“周立波，你来这里，首先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两篇光辉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周立波坦然地望着这位过去的老战友，憨厚地微笑回答：“毛泽东同志的书，都应该读。我过去也都读过。”说到这里，他突然皱起眉头，眯缝着近视眼，疑惑地凝视着对方。“可是，现在为什么单指定我读这两篇文章？”他沉思了片刻，两个嘴角的肌肉微微抽动了几下，细细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声调激动高亢，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南京政府的人！”

那位秃顶班长尴尬地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解释说：“这是上面的规定，凡是进‘专政班’的，都要学这两篇文章。这是我们的必修课，你怎么能例外呢？”

当时，我一方面暗自敬佩周立波的正直和胆略，另一方面对眼前的现实感到茫然、疑惑。

◇ 角落里的谈话

当天下午，周立波找我谈话。在当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处境下，我们选择在大院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交谈。

为了避免周立波的误会，我首先回忆了1958年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曾去香山访问他，并请他两次给我们人大同学讲话的情景。接着自我表白：“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因反对“顶峰论”被打成反毛泽东思想的“小邓拓”，也被专过政，后因我属“红五类”，又叫我来看管专政对象。

周立波听后，风趣地微笑着问我：“你是湘乡人吧？”

“我的家，解放前属湘乡，如今划归双峰县。”

接着我便问他：“您想找我谈什么？”

“毛主席最近讲，‘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还说有的专案组搞逼供信。搞我的那个专案组就是专搞逼供信的！他们给我强加的种种罪名都是查无实据，有意诬陷的。”

我回答：“‘事出有因’，我不理解，‘查无实据’的事，确实多得很哩。”

周立波面露愠色，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党的一贯传统是讲实事求是的嘛！”

接着他又说：“说是群众运动，只怕是运动群众。”

讲到这里，周立波很生气，接着说起他在湖南省公安局被监禁时的一些情况来。有一次，有人找他谈话，侮辱他的人格，他发了一通脾气，指着对方说：“你们把我当作敌我矛盾搞，你们不要犯斯大林同志晚期的错误，搞肃反扩大化！”还有一次，有两个外调人员威逼他写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材料”，被他严正拒绝。对方恼羞成怒辱骂他，他忍无可忍，拍着桌子说：“你们把我当敌人看待，我还怀疑你们是台湾派来的哩！”

当时，我完全忘却了自己的“身份”，被周立波大义凛然的精神所吸引，全神贯注地听着、思考着。

◇ “牛棚”里的批判会

周立波进“牛棚”不久，某些头头凭他们的特殊嗅觉，感知他“态度顽抗”，便决定“以毒攻毒”，策划由“专政班”召开批判会，整他的“态度”。一天上午，批判会在“牛棚”里进行，主持者首先强令周立波“交代罪行”。

周立波在座位上挺直身子，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从容不迫地说：“我是个写小说的，要打倒我，就要先打倒我的作品！”

还没等周立波说完，有人就站起来批判：“周立波，你还这么狂妄，顽固！你知道吗？江青同志在林副主席委托她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名批判过你。江青同志说，周立波这个人坏透了！他一写英雄人物，就要把英雄写死。”

周立波淡淡地一笑，缓缓地回答：“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嘛，有活着的英雄，也有死去的英雄。应该都可以写嘛。”他略微停顿了一会，继续说：“说我把英雄赵玉林写成被土匪打伤后死去，这种事在战争年代多得很嘛，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政治问题？”

周立波刚说完，另一个站起来，指着他：“周立波，你的态度还这么恶劣！对江青同志的批判你还反抗？康老还指名批判你啦。康生同志曾在一个会上说过，周扬有个侄子，叫什么周立波，写了一篇大毒草《韶山的节日》。他批判你造谣生事，写毛主席上坟，丑化了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

周立波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是周扬的侄子，屈指一算，相隔十多代，300年前共祖宗。”听他这么幽默的口气，我差点笑出声来。接着他提高了声调，显得有些激动：“即使是亲侄子，也不能算作罪状嘛。至于写《韶山的节日》，我是事先去韶山作过多次调查的。我写的内容，都是群众向我反映他们亲身经历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同志上山看父母的坟，确有其事，我不知毒在哪里？”他抬起头来，望着批判他的那位没挂白符号的人（“专政对象”都挂白符号），然后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要父母的嘛！”

那位不知趣的批判者还强词夺理：“领袖的个人生活，不能随便乱写！”

周立波偏着头，斜视了一下对方，继续说：“领袖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嘛！文艺作品为什么不可以描写？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生活，从恋爱、结婚到家庭，不都有人描写过吗？苏联的一些优秀作品，就真实而生动地反映过列宁、斯大林的个人生活嘛。”

“牛棚”的批判会，没能改变周立波的态度，于是便召开大会“围剿”。当时有人来动员我上台批判《山乡巨变》，我严正拒绝了。在批判会上，一些奉命批判者对《山乡巨变》、《韶山的节日》、《山那边人家》和《禾场上》等作品，肆意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在会上，周立波横眉冷对，不予理睬。会后回到“牛棚”，他取下头上的帽子，弓着身子，用手指着自己秃了顶的脑袋，对在场的一位副省长、一位老红军和我说：“你们看，我的头发都快脱光了。过去我每写一部小说，几乎都要病一场。真想不到今天因此挨批判！”说完，他热泪盈眶，泪珠簌簌地往下掉。

回想周立波来“牛棚”两个多月，平时整天微笑，从没发过愁，流过泪。记得有一次，我对他说：“有人说你是个书呆子，进了‘牛棚’还整天笑呢！”周立波含笑回答：“我没有值得难过内疚的事嘛！”如今，他为什么热泪滚滚？我想这是他对摧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暴行的悲愤吧！

◇ 同住“牛棚”小房

不久，灾难落到我的头上。以“立场动摇，包庇叛徒、走资派，吹捧黑作家”的罪名，对我进行批判斗争，最后也把我关进“牛棚”，与周立波同住一间小房。我初进“牛棚”，心情气愤、烦躁，公开顶撞学习班的一些头头。周立波慈祥地笑着对我说：“你是为我们受委屈的。不过，你对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这个波折，用不着后悔，也许这是千载难逢的生活体验呢！我不蹲国民党的监牢，就写不出《铁门里》。”在周立波的感染与教育下，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有时甚至还很开心。如每天强令做基督教式的“早请示”、“晚汇报”时，我常看到周立波不恭不敬地望着呢呢喃喃、念念有词的别人微笑，我觉得很滑稽，也跟着开心地笑起来。

在我进“牛棚”之前，还有一道无形的墙把我与周立波隔开，使我们不能畅所欲言。而现在我们就无所不谈了，使我从中获得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受到了难忘的教育。在“牛棚”中，周立波对我谈过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和他第一次见鲁迅的情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听毛泽东讲话的情景；参观托尔斯泰故居的感受等。我无论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都认真坦率地回答。有一次，我问他：“有人批判你的《禾场上》是一篇丑化贫下中农、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毒草，你有什么看法？”他回答：“看不到3000年中国小农经济私有制的历史包袱，就不能深刻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另一次，当我提到有人批判他的《山那边人家》写了一个爱发表长篇议论的兽医，是攻击党的领导时，他毫不含糊地说：“生活中不是有那样不择场合，喜欢讲空话、讲废话、讲大话的人吗？人民群众不是吃过这种空话、大话的苦头吗？人民群众很讨厌这种人，所以，我嘲弄讽刺这种人。”听了周立波的这些谈话，我深深感到，他不愧是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真惋惜，与周立波相处的时间太短了，在“牛棚”里只有3个多月。

特别遗憾的是，当他离开“牛棚”时，我们无法道别，并从此永诀。

我经常怀念周立波，他也一直没有忘记我。粉碎“四人帮”后，他曾多次向有关同志询问我的情况，在他重病住院时，还托金振林捎了一封信给我：“谭冬梅同志：你好！我时常想到你。听说你还在《长沙晚报》，希望常常写点文学评论文章。我因为病，不能多写了。”周立波的信，言简、情重、意深，是留给我最珍贵的纪念

□ 《湘潮》 2008年第8期

~~~~~

【往事回忆】

## 江青被捕前突访二七机车车辆厂

• 郭臣善 •

我们二七机车车辆厂，当年是铁道部直属中央企业和著名的“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编者注）之一。作为全国知名的先进企业，每逢重要节假日常有中央领导到厂慰问。我当年是厂里的工程师，曾有幸当面向朱德、邓颖超、徐向前等中央领导汇报过工作。

1976年10月3日下午，也就是“四人帮”倒台的前三天，江青突然来到我们厂“视察”。第二天，据说又去了保定。江青为什么在比较敏感的时候到我们厂来，作为小人物，其用意我们是无法知道的。这件事已经过去30多年了，当年参加接待的人多已作古，健在的也都进入暮年。在江青来我们厂时，我在党校学习，未能亲身经历这件事。我事后从曾经历此事的同事那了解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现记述如下。

### ◇ 突然造访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会。追悼会后一个星期就是国庆节了，但上级通知我们，不举行庆祝活动，领导下基层和群众一起过节日。我们厂曾是全国知名先进企业，毛泽东、朱德、邓颖超、徐向前等都来视察过，张春桥、王洪文也曾光顾。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国庆期间，很可能有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来看望加班的工人。为此，按往年惯例，我们厂发动职工彻底清理环境卫生，整顿厂容，已使用半个多世纪的厂部和党委会议室、办公室平房的门窗经过修整、油漆、更换窗帘，面貌一新。10月1日至3日放假期间，工厂妥善安排了设备检修和关键岗位工人加班，厂领导轮流值勤，随时准备接待中央首长，可直到3日中午下班也没有任何动静。只剩半天时间了，4日就要正常上班，节日加班任务也接近尾声，大家都以为不会有高层领导来了。

当天下午还没到上班时间，值班室突然接到电话，说中央首长探望工人，很快就到。因不知道首长级别和姓名，又不许询问，值班室人员不敢怠慢，迅速通知能够找到的厂领导。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接待人员还没准备就绪，首长的小轿车就进厂了。从车里下来披黑色风衣的人，大家一下就认出是江青。陪同她来的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等。

江青一行被领到厂部会议室。厂部的会议室比较大，在整栋平房的北端，只有南面连接内部走廊，其余三面都是玻璃窗。室内有铺着台布的大会议桌，可容纳三四十人。江青说她身体不好怕风，还有不时要上卫生间的毛病，希望安排一下。

参加座谈的人大概有二十多人。在座谈会上，江青没有长篇大论，也没什么中心话题，想到什么说什么，并要求不要记录。她问工厂党委书记张锐多大岁数了。当得到五十五的回答后，江青顺口说道：“五十五出山虎，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接着，江青说：“我要到你这个厂的生产一线劳动，由你负责给我安排一个适当班组。”又问张书记：“你们厂还有没有至今健在曾参加过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的老工人？”张书记说有，并即刻派人请来住在工厂附近70多岁已退休多年的杭宝华。

江青强调这次主要是看望工人，并对在场的搬运工老师傅王焕文提出晚饭到他家去吃。王师傅不敢答应，推辞说：“我没有好吃的东西招待首长。”

江青说：“我不喝酒，不吃肉，越简单越好。”

王师傅一时很为难。这时党办主任赵学勤觉得无论如何不能驳首长的面子，开导他说：“你家住工厂宿舍区，又是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关键时刻可不能退缩。”

王师傅苦笑着说：“就我家住的那小平房，窄得转不开身，家里要啥没啥，实在没办法接待首长。”

赵主任只好硬着口气说：“这是政治任务，你代表全厂万名职工，必须全力以赴，没有商量的余地。”没办法，王师傅只好应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江青接着说：“现在毛主席尸骨未寒，中央斗争十分激烈，大家一定不要只陷于悲痛之中，必须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她的视线忽然转向杭宝华说：“你是参加著名二七大罢工的老前辈，现在如果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你敢不敢带头罢工？”

杭老没有思想准备，急不择言地说：“坚决服从党中央。”

之后，江青把目光转向一位厂中层干部，问他：“你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吗？”这位干部即背诵了《红楼梦》中的名段“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江青说：“背诵片段还不够，这本书至少要仔细通读5遍。”当她看到有人在笔录，就说：“我最讨厌别人记录我的话。”随即提出要去生产现场，并在离座前再次叮嘱王焕文：“说定了，我去你家吃饭啊！”

王师傅赶忙说：“我家条件差，要委屈首长，家里还不知道，我得赶快回家为首长准备饭。”

江青一行出了会议室，由接待人员带领，向西穿过修机车间到工具车间。两间宽大的厂房只有个别机床在加工急需的配件。江青上前和在岗工人打招呼，询问一些简单情况，还伸手摸了加工好的成品。工人急忙递上擦拭油污用的清洁棉让她擦手。

与此同时，党办赵主任陪同一个警卫员去王焕文家察看准备情况，发现他家餐具不够用，就让工厂食堂准备一套消毒碗筷送到王师傅家。

江青从工具车间出来，直奔工厂南门交车线。当时正有一台等待出厂的北京型机车停在那里。接待人员找到值班员拿来钥匙，打开车门。江青登上机车坐在驾驶室操纵台前，提出要在厂内铁路线上坐机车巡视一下。碰巧换向机构出了问题，机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江青未能如愿，便说了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我和这车头一样，也是只能前进没法后退。”没办法，只得由俱乐部的乔贵生拍了一些照片草草结束。之后，江青出工厂西门，来到王焕文家。

在食品极度匮乏的年代，王师傅也没什么好招待江青的。菜是炸花生、西红柿炒鸡蛋、炖豆角，主食是白面和玉米面混合蒸的馒头。因怕提前出锅馒头凉了，没想到临上桌揭开笼屉才发现馒头全开了花。王师傅面露难色。有人马上圆场说：“师母厨艺神了，蒸的馒头开口笑，喜迎贵客。”随员也跟着附和，算是给王师傅解了围。

由于工厂放假，厂内加班和值勤的人很少而且分散，江青来厂之事知道人不多，就连在厂

加班和值班的职工也有不知道的。

#### ◇ 神秘的专列

10月5日刚上班，参加座谈会的五六个人被从不同岗位召集到一起，又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他们被告之，不许再回本部门，不许告诉家人，立即上车出发。他们还没回过神来，汽车已到北京火车站，并且直接开上站台，停在一列专运客车旁。他们上了专列后才发现，车内设备非同一般。专列服务人员发话，不许走出车厢，不许打开车窗，不准拉开窗帘。当有人问到什么地方时，服务员回答，我们也不知道，到时候自然就明白了，不要多问。过了一会儿车开了，仍无人理睬他们。

北京站是尽头车站，四面八方的列车都走同一条出站线，看不到车外景物就不知道专列是去向何方。有心细的人从窗帘缝隙中仔细窥探，辨认出丰台，又过一会儿一闪即逝的熟悉建筑从眼前掠过，知道专列正行驶在京广铁路上，朝石家庄方向行驶。没过多久，专列停了下来。过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专列服务员告知，专列不走了，你们可以下车活动，不要远离，随时可能开车。下车之后，人们才知道，专列停在一个小站，四周全是田野，从站房和站牌才知道，这个小站叫于家庄。有人以前试车时曾来过。火车司机必须遵守列车运行图，停站和运行时刻不许随意变动。临时变动要执行上级命令，哪个区段加速，哪个区段缓行，什么地方停车，都要毫不含糊。又过了很长时间，远处一辆军用吉普车直奔站台，披着黑色风衣的江青在两名军官的陪同下上了专车。专列很快启动。虽然看不到车外，凭感觉知道专列朝北京方向驶去。后来让他们在专列的餐厅吃了午饭，每人交4两粮票8角钱，多数人没带暂由别人代交。饭后很久，江青在专列的会议室接见了他们。这次，江青一人唱独角戏，大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四人帮”被粉碎后，根据上级指示，江青这次到我们厂活动的一切文字记录和图像资料全部封存上交。

我们厂现已更名为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江青坐过的那辆北京型客运机车已不知流落何处，王焕文家所在的简陋平房区早已拆除变为长辛店建设三里的大片楼群，唯有接待过江青的厂部会议室仍在，见证着过去的历史。

□ 《百年潮》 2008年第6期

~~~~~

【往事回忆】

北大社教与常溪萍之死

• 冯 乔 •

◇ 祸起萧墙

1964年，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几个主要城市都要派一批教育战线上的部级和处以上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参加社教运动。上海派了由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常溪萍带队的工作队去北京大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队担任副队长兼西语系工作队负责人。当时，北大处于半瘫痪状态，原先的社教工作队把北大当做“烂掉了”的单位，要打击一大批校、系领导干部。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处境也十分艰难。

起初，陆平对常溪萍也没什么好感，觉得他带社教工作队来仍然会像以前一样。为此，常溪萍到北大后，与陆平作了一次长谈。常溪萍在耐心听完陆平对北大情况的陈述后，拿华东师大和北大做比较，说：“我认为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基本上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是好人犯了一定的错误。”陆平非常感激常溪萍能够这样看自己。

为了纠正北大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常溪萍就写了个报告，打算向上反映。可是，北大社教工作队的主要领导在常溪萍的报告上写了个大“右”字否掉了。

1965年春，因为对北大社教的不同看法，常溪萍向上海市委作了口头汇报。第一次汇报是常溪萍向上海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两个人汇报的。张春桥对北大社教情况和分歧是非常清楚的，认为常溪萍提出的不同意见和向上级汇报都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之后，常溪萍又书面向上海市委杨西光和张春桥写了两封信。他们再一次画圈同意。

1965年3月17日，常溪萍在上海市委完全同意的情况下，给邓小平、彭真等写了一封信，如实反映了北大社教运动中的问题。信中就北大社教的主要领导执行的路线提出异议，认为违背了“二十三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对照“二十三条”，北大不是属于烂掉的单位。如果北大是烂掉的，华东师大也是一样的，都贯彻了“二十三条”，那不是也烂掉了？也不是说北大没有错误，但是说北大烂掉了，常溪萍有看法。

邓小平在处理这件事情之前，听取了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的意见。因为北大社教是受两个部门直接领导的，一个是北京市委，一个是中宣部。万里的意见很明确：“常溪萍这个人是正派的，北大是搞得过头了”。邓小平于是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并写过一段话：“看来北大社教要换一下领导人了”。这样，北大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被换掉，由另外一位同志主持工作。

树欲静而风不止。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北京大学的风云人物聂元梓等人兴风作浪，又贴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矛头指向已经担任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的常溪萍，并由此彻底改变了常溪萍的命运。

一天晚上，北大召开群众大会，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参加了大会。在这次开会之前，聂元梓一伙对江青说，我们这里有一张大字报，听说常溪萍还在主持上海的“文化革命”运动，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他是出卖北大社教的黑帮分子，是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我们写了一张大字报，希望这张大字报能够转给上海市委。江青立即拍板说，“可以啊，我们给你转”。有人赶快取来泛黄的大字报，一式两份交给江青，江青又当场把大字报交给张春桥。张春桥马上表示：“保证给你送到”。

而当时由常溪萍写的有关社教运动总结信的时候，张春桥也有过批示，是签字画押了的，十分清楚事情的经过。张春桥当时拿了这张大字报，一时也犯了难。正好这个时候中央开会，曹荻秋也到中央开会，张春桥便灵机一动，把大字报交给了曹荻秋，而且加了一句话，希望上海市委能够妥善处理这件事情，否则会被动的。

被动，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下是个什么词语？是压力，政治压力啊！就是你们要积极对待，否则你们就担保了常溪萍。曹荻秋拿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心里也很不安，因为他们都是同意过的，而且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后来，张春桥和杨西光提请陈丕显主持书记会议讨论，明确常溪萍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同意他向上反映，并把这个意见让当时的上海市委教卫部办公室主任邱敏珠通知常溪萍。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曹荻秋先通过秘书找到康生。康生开始是接待了，但由于有人找他有事，就没有接待下去。之后多次联系，康生则百般推诿。之后，曹荻秋通过秘书找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当年主持了北大社教运动，而且指示处理了这件事情。找到邓小平以后，邓小平在家里接待了曹荻秋。邓小平非常明确地说：“这件事情，当年中央书记处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贴。”曹荻秋说：“这件事情，康生同志也知道。”邓小平说：“康生那里我跟他说。”

第二天，消息传到了江青那里，江青说：“你们上海市委不贴这个大字报，我去贴。”

其实，当时的人都知道，常溪萍写的那封信不是个人行为，是组织行为。江青等人揪住常溪萍，也就是揪住了上海市委，才有“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口号，并进而借机对上面发难，因为那封信是邓小平亲自批示的。

由于江青的直接插手，曹荻秋只得通过机要把手大字报要了回来，贴了两份，教卫部贴了一份，华东师大贴了一份。

◇ 激烈交锋

1966年11月，两张从北京带来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但围绕打倒还是保护常溪萍，从中央到上海市委到大学展开了激烈交锋。

聂元梓的大字报要把常溪萍打成叛徒，但是光凭常溪萍给邓小平这封信就定为敌我矛盾，他们自己恐怕也讲不出来的。因为，邓小平讲得非常清楚，这是“当年中央书记处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不要再挑起”。

有一次，市委几位书记集体到了师大，包括曹荻秋、陈丕显、王一平、魏文伯、杨西光，要保常溪萍，说常溪萍同志是个好干部。

诬陷常溪萍的大字报贴出来后，华东师大展开了大辩论，绝大部分干部群众都认为常溪萍是教育战线上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不相信常溪萍会是什么大叛徒。

常溪萍看了大字报后没有吱声，因为这涉及上海市委的内部机密。

聂元梓看到上海对常溪萍没有什么动静，就跑到上海，到处煽风点火，引起她所住的衡山饭店的饭店职工的强烈不满，把她赶了出去。当时聂元梓没有地方呆，就让人用脚踏三轮车把她送到华东师大。

上海文化广场曾召开过万人大会批斗常溪萍，聂元梓去讲话，说常溪萍根子很深，下连着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上面还有根子，当时还点了彭真的名。

围绕打倒或者保护常溪萍，各方面的力量激烈交锋。一会儿这边占了上风，一会儿那边占了上风。看到常溪萍打而不倒，出尔反尔的张春桥窜到华东师大，直接跳出来迫害常溪萍。张春桥到师大，说要看一看师大的红卫兵小将。他开始说对常溪萍的问题不了解，将自己撇清。接着，又给常溪萍上纲上线，说看一个干部不是看他的一时一事，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要看他关键时期、关键问题上的态度。

张春桥这一番话讲话后，造反派开始占了上风，并把常溪萍隔离在宿舍里。

有一天，上海造反派要搞红色恐怖，司机庞学友晚上开汽车把常溪萍藏到松江的小姨子家。常溪萍在阁楼上躲起来，躲了一个礼拜。有时庞学友干脆让常溪萍坐在汽车里到处躲避。后来，师大有人把常溪萍出卖了，造反派强行把他拉出去斗。庞学友也因此也受到牵连，在公安局被关了24天，但他始终不服。至于为什么要保常溪萍，庞学友说：“我腿摔坏了，我到医院去看腿。常溪萍到我家看我，不在，到医院看，又到我家，我又到医院，照顾我，当时感动得我眼泪水都流了出来。那么大的九级干部看我一个小车工人，这样的态度，我为什么死保他呢，就是这个道理。他对我那么好，我就是要报报恩。”

◇ 常溪萍之死

常溪萍被关进了牛棚，和哲学系教授冯契隔离在一个房间。他俩利用这个机会看书学习，共同订了一份《人民日报》。由于造反派对冯契看管不是太严，除了毛泽东著作之外，还可以看一些马恩的著作。两个人在造反派不在的时候，还交谈交流一下哲学问题。冯契回忆说，常溪萍是非常坚定的，而且还劝冯契，要能够经得起这次考验。

有一次批斗完了以后，中文系总支书记车永明走到常溪萍的身后，车永明实际上是常溪萍亲自提拔起来的一个年轻干部。当造反派都走光了以后，周围没有人了，车永明和常溪萍进行了简单交谈。当时常溪萍说：“小车，你没有经过延安整风的考验，你这一次要经得起考验啊！”车永明回答：“常校长，你放心，我会做到的。”

迫害不断加剧，常溪萍的夫人陈波浪说，两个人在分别隔离的时候，都交代过一句话，不要相信我是会自杀的，你们都不要相信这个。

1968年5月25日下午，常溪萍从华东师大数学馆三楼阶梯教室窗户坠落下来，被送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徐景贤下达指令，说不要让常溪萍死，不要让他把材料带走，你们要全力抢救。为此，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派陈中伟等专家来抢救。抢救了两个多小时，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常溪萍内脏全部摔坏了。然而，造反派在第二天批斗会上硬说常溪萍畏罪自杀。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孙殿林参加清查清理工作，第一个重新审查的就是常溪萍的案子。他把自常溪萍坠落直到送到医院抢救的全部记录都看了，记录显示，常溪萍中间苏醒过几次，并申明“我不是自杀”。

1978年4月2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委为“党的好干部”常溪萍平反昭雪。那些参与迫害常溪萍的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本文据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采访常溪萍秘书孙殿林、司机庞学友整理）

□ 《百年潮》 2008年第6期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